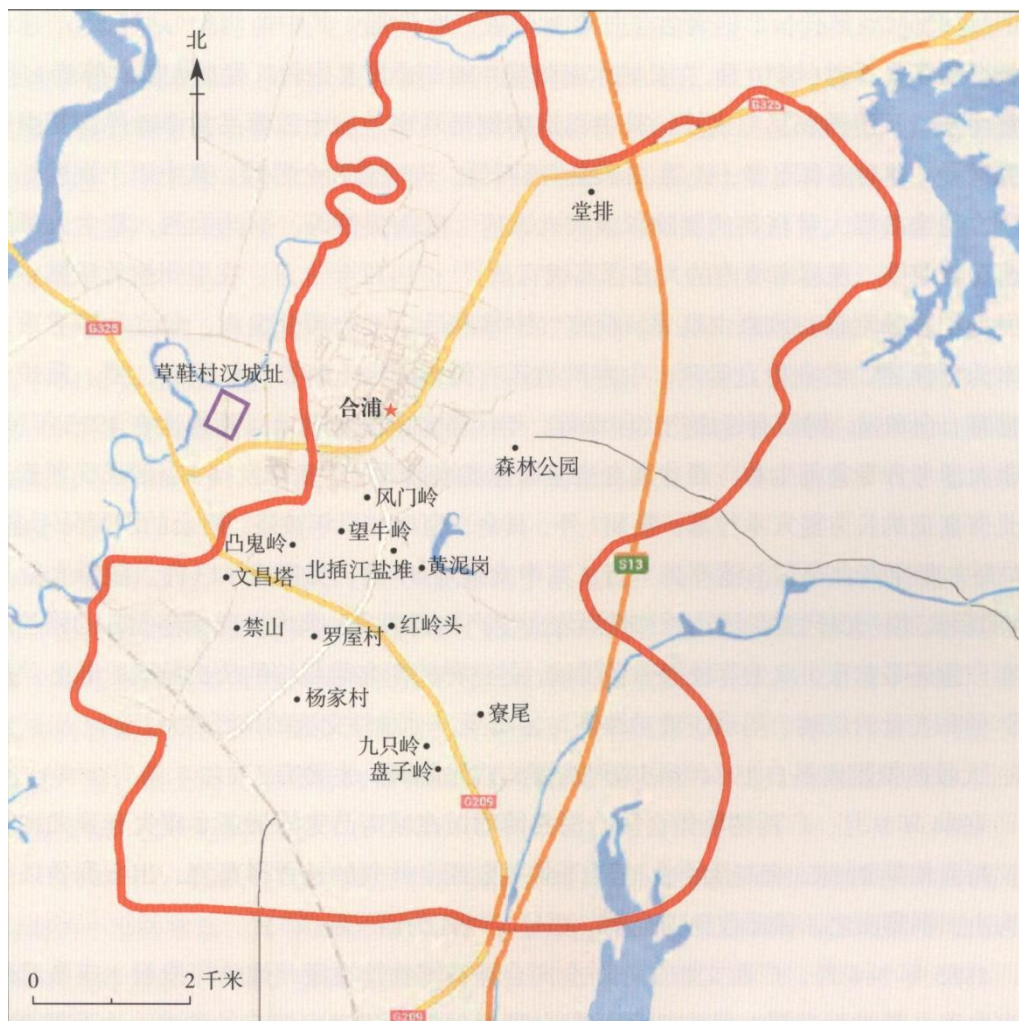


第三章 合浦汉墓研究

合浦汉墓群是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分布于西门江以东的县城及其东、南、北三面,面积约68平方千米。地表现存的封土堆有1056个,从历年多个墓区的勘探和发掘情况来看,有封土堆和无封土堆的墓葬比例接近1:9,以此估算,地下墓葬的埋藏量有约上万座^[1]。可以说,合浦汉墓群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墓葬群之一。

合浦汉墓群的发掘始于20世纪50年代,截至2013年,发掘古墓葬数量已超过1200座(图一七)。这批墓葬,以汉墓^[2]居多,次为三国墓,还有少量晋墓和南朝墓。按构筑材料和方式的不同,汉墓可分为土坑墓、木椁墓、砖木合构墓(主要为砖圹墓)和砖室墓四类,出土文物近2万件,主要包括陶器、铜器、铁器、金银器、玉石器、玻璃器及各类珠饰。在历年发掘的基础上,考古工作者加强资料整理,出版和发表了一系列专刊和发掘报告,为探讨合浦汉墓的形制、器物演变及断代分期奠定了基础,也为研究合浦汉墓的出土器物、埋葬习俗、文化源流和区域特征等提供了可靠的资料。汉墓出土有关海上丝绸之路文物,更是研究中西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

由于发表和出版的合浦汉墓资料较多,本章仅对以往的发掘和研究略作梳理,并就其分期、区域特征等,阐述一些个人看法。



图一七 合浦汉墓群的分布及主要发掘地点

第一节 以往发掘与研究

一 发掘简况

合浦当地民众对于汉墓的认知时间其实很短。现存崇祯十年版、道光版的《廉州府志》及民国三十一年版的《合浦县志》，均无汉墓发现和出土文物的记述。新中国成立初期，当地百姓还把出土的砖室墓称为“直眼佬屋”，传为小个子、单眼竖直的外来人种所居房屋。直至1957年4月，广东考古工作者（1955年5月~1965年6月合浦属广东省辖）在杨家岭和廉东钟屋各清理砖室墓1座，两座墓葬结构类似，均由斜坡墓道和墓室两部分组成，其中杨家岭墓出土陶罐、陶壶、银戒指和铁匕首，钟屋墓出土陶盂、陶屋、铁棺钉、五铢和半两铜钱等器物^[3]。自此，掀开了合浦汉墓发掘和研究的序幕。

20世纪70年代，广西考古工作者共开展三次发掘，其中前两次为配合生产建设的抢救性发掘。1971年10月，在县城东南郊望牛岭的合浦县炮竹厂发掘大型木椁墓1座，该墓由墓道、甬道和墓室组成，其中甬道两侧带耳室。出土随葬品共245件，其中以铜器居多，其余还有陶器、铁器、漆器、玉石器、琉璃器和金器等。墓中出土铜风灯、金饼、珠饰品等大量精美的器物以及“九真府”款陶提筒等，据此推测，墓主人可能是西汉晚期位于现越南境内的九真郡高级官员^[4]；1972年3月，在廉州炮竹厂第一仓库发掘1座砖室墓，该墓由墓道、前室、中室和后室四个部分组成，前室为横券顶，中室为穹隆顶，后室为直券顶，中室两边还有侧室。出土陶器有长颈壶、樽、熏炉、灯模型、仓和屋，铜器有镜刷把、印章等，年代当为东汉晚^[5]。后一次在1975年秋，中山大学考古专业师生和广西壮族自治区考古训练班学员在堂排发掘4座西汉晚期墓，均是带墓道的长方竖穴木椁墓。除M2外，其余3座均在早年被盗，所余的随葬品不多。M2为夫妻异穴合葬墓，随葬品丰富，其中女墓有87件，男墓有143件。随葬大批兵器和农具，说明汉代对巩固边陲和发展农业生产相当重视；墓内发现保存完好的稻谷，这在广两还是首次；出土荔枝果壳和果核，是这种岭南名果栽培的历史见证；出土“胡人”俑和大量的琉璃、玛瑙、琥珀珠饰，说明了当时对外交流的广泛性^[6]。

大量的发掘则是自1984年以来配合基本建设展开，主要有：

1984年9月，广西博物馆会同合浦县博物馆在城南凸鬼岭清理2座夫妻异穴合葬墓。两墓相隔22米，每座墓的封土堆下各覆盖两个并列的长方形墓穴，出土器物以陶器为主，铜器次之，铁器仅见刀、剪、钺等，年代为西汉晚期^[7]。

1985年3~4月，广西文物工作队会同合浦县博物馆在廉州炮竹厂发掘1座西汉晚期木椁墓。斜坡形墓道，椁室四周填以白膏泥封护。墓道底端有外藏椁，内存铁斧1件^[8]。

1985年5~7月，广西文物工作队会同合浦县博物馆在望牛岭和风门岭共发掘墓葬13座，出土器物300余件。其中风门岭发掘土坑墓3座，砖室墓5座；望牛岭发掘土坑墓4座，砖室墓1座。土坑墓中，4座为同坟异穴合葬墓，随葬器物较丰富，以陶、铜器为主，另有滑石器和铁器出土，其中风门岭一座墓出土的1件铜铎壶，肩部刻有“西于”二字（“西于”为交趾郡属县，位于今越南首都河内西北）。砖室墓多被盗扰，所余器物不多^[9]。

1986年4月，合浦县博物馆在丰门岭（即“风门岭”）第二麻纺厂发掘古墓10多座，其中M10保存较完整。M10为穹隆顶合券顶砖室墓，由墓道、前室和两后室四部分组成。东后室置陶器和铜

器，西后室安放木棺，装饰品多出自这里，前室也出土少量器物。该墓出土器物较多，包括制作精美的珠饰和成套的葬玉等。至于墓葬年代，报告定为东汉早期^[10]。

1987年3月~1988年5月，为配合南宁至北海二级公路建设，广西文物工作队会同合浦县博物馆在县城东南的文昌塔发掘古墓227座，年代为西汉初至东汉时期^[11]。有土坑墓和砖室墓两类，其中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数量较多，带墓道者有斜坡式、台阶式和斜坡加台阶三种，部分无墓道；砖室墓平面呈长方形、凸字形、十字形等，多被盗扰严重。出土器物主要有陶器和铜器，铜器见成套的井、仓、灶模型明器。正式的发掘报告，已于近期出版^[12]。

1991年7~8月，广西文物工作队会同合浦县博物馆在县城南母猪岭发掘6座东汉时期的小型砖室墓，其中M6为砖圜墓，余为直券顶墓。从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来看，M1和M6为东汉早期，余属东汉晚期^[13]。

1990~1996年间，合浦县博物馆先后在母猪岭抢救性发掘墓葬10座，报告其中5座，包括3座木椁墓、1座砖圜墓和1座直券顶砖室墓，木椁墓的年代为西汉晚期，后两者均为东汉晚期。出土器物以陶器为主，铜器次之，铁器较少。木椁墓和砖圜墓保存完整，除陶器、铜器、铁器、玉石器外，还出土玻璃、琥珀、水晶、玛瑙、绿松石等珠饰，其中以玻璃串珠为最多，完整的就达6234颗^[14]。

1995年5月，广西文物工作队在中站盘子岭发掘砖室墓38座，其中1座为合葬墓，年代分属东汉早、晚两期。形制以直券顶墓居多，部分为砖木合构墓、穹隆顶合券顶墓和双穹隆顶墓。仅2座墓葬保存较完整，其余盗扰严重，所剩随葬品很少^[15]。

1996年12月，广西文物工作队在禁山七星岭发掘砖室墓11座，均破坏较严重。除其中1座为无墓道的单室墓外，其余带斜坡墓道，直券顶墓或穹隆顶合券顶墓，墓室前端有甬道，多带侧室，部分后室的前端还有祭台。出土陶器、铜器、滑石器和铁器等，报告者把年代均定为东汉晚期^[16]。但这批墓葬出土的B型陶灶、陶莲花状器、铜提梁壶等器物，不见于当地汉墓，而与岭脚村、寮尾等三国墓所出相类，因此，M3、M4、M8等部分墓葬的年代应已晚至三国时期。

1999年4~5月，广西文物工作队会同合浦县博物馆在凸鬼岭发掘汉墓17座，有土坑墓、砖木合构墓和砖室墓三类。随葬器物以陶器居多，其中M6和M11出土滑石器较多。墓葬年代分属西汉晚期、东汉早期和东汉晚期^[17]。

2001年7月，广西文物工作队会同合浦县博物馆在九只岭发掘墓葬6座，其中明墓1座，余5座为东汉墓。东汉墓分砖木合构墓和砖室墓两类。砖木合构墓中，M5为砖木合构墓，竖穴，木椁，仅封门用砖；M6a为穹隆顶合砖圜墓。出土器物主要为陶器和铜器，还多见金花球、玻璃、琥珀、玛瑙等珠饰。这次发掘，不仅填补合浦汉墓一些形制上的空白，更为建立可靠的东汉前、后两期断代标尺提供了资料^[18]。

2003年11月，广西文物工作队会同合浦县博物馆在罗屋村发掘砖室墓6座，该墓地盗扰严重，随葬品多已无存。从形制和残存器物观察，墓葬年代应为东汉晚期，部分下限也可能晚至三国时期。其中，M3墓葬开口两侧发现排列整齐的两列柱洞，两两相对，应为墓上建筑遗存；M6位于墓区西边，游离于墓群之外，平面呈长方形，平砖盖顶，墓室长1.75、宽仅0.3、高仅0.2米，随葬小陶罐1件，墓主应为未成年人^[19]。

2003年底至2005年初,广西文物工作队会同合浦县博物馆在风门岭发掘汉墓8座,包括木椁墓和砖室墓。出土陶器、铜器、滑石器、金银器、铁器、珠饰等一大批珍贵文物,年代跨西汉中期、西汉晚期、东汉早期和东汉晚期四期,其中M27断为西汉中期^[20]。

2005年8~9月,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合浦县博物馆在文昌塔发掘汉墓8座,其中6座为西汉晚期,余2座分属东汉早、晚期。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较以往的发现更具地域特点,为该墓区汉墓分期以及了解合浦汉墓的区域特征均提供了重要资料^[21]。

2005~2009年,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在禁山、风门岭、炮竹厂、凸鬼岭、杨家山等地陆续开展抢救性发掘,发掘古墓56座,年代从西汉晚期延至南朝,其中以汉墓居多。汉墓有木椁墓、砖木合构墓、砖室墓三类,砖室墓又分直券顶、横直券顶、穹隆顶、穹隆顶合券顶等。砖木合构墓和砖室墓多遭盗扰,随葬品所余不多,部分甚至被盗掠一空;木椁墓的保存情况稍好,出土随葬品也较多。随葬品以陶器为主,另有铜器、铁器、银器、玉石器及琉璃、玛瑙、琥珀、水晶等珠饰^[22]。

2008~2009年,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还在寮尾墓地发掘古墓32座,因发现重要,故单独报告。其中东汉晚期墓7座,三国墓25座。汉墓形制有砖圹墓和砖室墓两类,砖室墓又可分为直券顶墓、横直券顶墓和横直券顶合穹隆顶墓。出土的青绿釉陶壶、铜钹、胡人俑座灯、焊珠金饰片、钠钙玻璃、蚀刻玛瑙珠等较多与海上丝绸之路密切相关的器物,一些尚属初次发现^[23]。

2009~2013年,为配合各项基建项目,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在杨家山、禁山官塘岭、汽车齿轮厂、第二炮竹厂、廉州乳品厂、精神病院、电厂、迎宾大道、罗屋村、沿海铁路合浦段、中站李屋村、森林公园、南方机械厂、中站庞屋队、火车站等15处地点陆续发掘古墓157座,年代跨西汉晚期至晋代。其中汉墓62座,有土坑墓、木椁墓和砖室墓三类,主要为砖室墓。出土陶钵生莲花器和卷棚顶陶仓等一大批重要文物^[24]。

2012年6~9月,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对位于大浪古城北面、编号为D2的土墩墓开展发掘。墩体为一墩多墓结构,共发现3座长方形熟土坑墓。随葬器物有陶甗、杯、瓮,年代为秦至西汉早期,这是岭南地区第一次确认土墩墓的存在。之前2003年试掘的D1,亦应为土墩墓。从器物来判断,年代略晚,为西汉中期^[25]。

此外,还有许多未公开发表的墓葬资料。合浦县博物馆的藏品显示,1974~1995年间该馆至少还抢救性发掘了汉墓88座,其中包括出土器物较丰富的西汉晚期盐堆M1(1978年)和东汉早期黄泥岗M1(1990年)等。黄泥岗M1随葬滑石“徐闻令印”和龟钮“陈褒”铜印,墓主应是东汉早期徐闻县令“陈褒”,这是合浦汉墓中唯一一座明确墓主身份地位的墓葬。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等单位,也藏有历年发掘的墓葬资料,惜未整理刊布。

二 以往研究

以往的发掘报告和研究集中在墓葬分期、出土器物和埋葬习俗等方面,而就合浦汉墓的整体研究尚未展开,至今还没有一本系统、全面的专著出版。有关合浦汉墓的文化因素分析以及与海外贸易相关出土珠饰的多学科综合研究,也有待于在更广阔的视野下深入开展。

(一) 墓葬分期研究

墓葬分期对于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考古学研究不可或缺,一些与中西交流相关的文物,其传

播的时间节点须相对明确。另者，分期可以更好地补充、证实与信史对应的有关记载。这在历史时期考古中，也尤为重要。

岭南汉墓的分期多以广州汉墓为参照。广州汉墓分布集中，年代序列完整，在20世纪50~60年代发掘资料的基础上，麦英豪等根据墓葬形制和主要陶器的演变等划分为五期，其中西汉墓分前、中、后三期，东汉墓分前、后二期^[26]。虽有学者对西汉前期墓的断代提出异议^[27]，但就总体而言，广州汉墓的分期体系仍不失为指导岭南地区秦汉考古的重要标准。合浦汉墓亦循此例，为与中原及岭北其他地区统一起见，分为秦代和西汉早期、西汉中期、西汉晚期和新莽时期、东汉早期和东汉中期等五期^[28]。

历年发表的报告，大都涉及分期研究。《合浦风门岭汉墓——2003~2005年发掘报告》分析了8座汉墓的形制、典型器物组合和演变规律，将其分为西汉中期、西汉后期、东汉前期和东汉后期^[29]。报告注意到合浦汉墓发展演变的滞后性，力图构建区域的分期体系。西汉晚期的木椁墓，除此次发掘保存基本完好的M23和M26外，还参考了合浦其他墓区之前发掘的同时期墓葬资料，但断为西汉中期的墓葬，仅M27一座，依据显然不足；九只岭发掘的5座东汉墓中，保存完整的M5和M6，典型器物演变明显，因而建立了可靠的东汉前后两期的断代标尺；2008~2009年发掘的寮尾墓地，地处墓葬群的边缘地带，以三国墓居多。这批三国墓，形制和器物与东汉晚期墓存在密切联系，但发展演变仍十分清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从汉代大一统国家到三国分治的社会变革。此前，虽有学者注意到东汉晚期墓至三国墓形制的一些变化^[30]，但这次大规模的发掘，对系统了解“合浦汉墓群”的内涵、东汉晚期至三国墓葬的分期演变，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新近出版的《广西合浦文昌塔汉墓》收录墓葬175座，亦仿《广州汉墓》分为五期。其中，断为第一期即西汉早期的64座，或可商榷。我们注意到，其中的30座宽坑墓，多有横向枕木沟。仅4座随葬器物均为越式器，见罐、联罐和甑；余26座的陶器以罐为主，其中2座为瓮罐组合，随葬器物均为越式和汉式共存，大致各占一半，汉式器可见陶鼎、盒、壶、小碗、釜、带钩、纺轮、铜镜、铁钎等，较窄坑墓随葬汉式器的数量和种类均有增加，故年代也应略晚。较为明显的，如M011，陶器组合以瓮罐为主，还见陶壶、滑石盘和滑石璧，这种陶器组合以及滑石璧替代玉璧的形式多见于广州西汉中晚期墓葬；又如M113，该墓是第一期中唯一一座带斜坡墓道的宽坑墓，亦为瓮罐组合，出土的陶瓮和陶壶形制在合浦其他墓地的西汉中晚期墓中较为常见。因此，我们认为第一期墓葬的宽坑墓中，至少有相当部分应归入西汉中期。这种汉越文化杂糅的现象，或许正是合浦置郡县后，汉文化大举进入，进而对本地越人葬俗产生冲击的复杂阶段的反映。此外，由于该发掘时日已久，报告中许多墓葬信息缺失，现场照片没有发表，砖室墓券顶形状无一描述，也没有做出基本判断；一些非常重要的文物被遗漏，没有列入报告^[31]；与之前发表的许多报告相类，未使用“木椁墓”这一学术界普遍认同的形制概念，把木椁墓混同于土坑墓。因此，对该报告的分期，尚需更多发掘资料来印证。

还有部分报告的分期，由于发掘者的认识不一，结论亦不尽相同，特别是在东汉早期与东汉晚期墓、东汉晚期与三国墓的分期上，甚至出现了一些偏差。比如，风门岭M10的简报中，对陶器作了不恰当的比对，还把出土的大泉五十和货泉当成该墓属东汉早期的证据。之后，有学者更正为东汉晚期^[32]。又如，禁山七星岭发掘9座墓，简报均断为东汉后期，但从其出土的铜提梁壶、

B型陶灶等器物的型式来看，部分墓葬的年代已晚至三国时期^[33]。此外，五期划分法并非完美无缺。东汉晚期上限以建初为界，下限到东汉末年（公元220年），年代跨度达140余年。一些报告注意到早晚期之间的过渡阶段，笼统提及“东汉中期”^[34]，但由于材料过少，阶段的特征无法明晰。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分期多着眼于各个发掘墓区，而针对整个合浦汉墓的统一分期，目前尚未确立。随着合浦汉墓在研究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学术界愈加重视合浦汉墓的研究。近年来，一些硕博论文及博士后出站报告选择了合浦汉墓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多涉及断代分期的内容^[35]。其中，富霞收集140座合浦历年发掘的汉墓，对其形制及随葬器物作系统研究，尝试建立本地区统一的、科学的分期标准。

（二）出土器物研究

有关合浦汉墓出土器物，除报告所做的基础研究外，海上丝绸之路相关文物、青铜器等也有不少著述，其余器类则多为旁及。

汉墓出土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的文物，尤其玻璃器是研究的热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安家瑶^[36]、史美光^[37]、黄启善^[38]、干福熹^[39]、王俊新^[40]、李青会^[41]、王伟昭、熊昭明、碧姬·博雷尔(Brigitte Borell)^[42]等国内外学者持续关注，对其型式、成分特征和来源等进行探讨。2010年，熊昭明和李青会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合浦汉墓出土玻璃器为主，对广西出土的汉代玻璃器开展考古学和科技综合研究，并与周边地区、东南亚、南亚及地中海地区出土的同期玻璃器进行比较，分析其制作技术、成分体系和源流等。他们的初步研究表明，合浦出土的玻璃器主要为本地自制，还有部分来自东南亚、印度和罗马等地，初步厘清了合浦出土玻璃器的源流^[43]。其他研究对象，还有铜钹^[44]、波斯陶壶^[45]和金饰品^[46]等。熊昭明还对合浦汉墓出土的有关海上丝绸之路文物进行了系统阐述，这些文物囊括了玻璃、石榴子石、琥珀、肉红石髓、玛瑙、蚀刻石髓珠、水晶、绿柱石、黄金等饰品及作为非贸易品的波斯陶壶和铜钹^[47]，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

除前述输入的铜钹外，其他铜器的研究也较多。富霞将合浦出土汉代青铜器作系统梳理，还联系海南、徐闻、越南北部等北部湾地区的发现，初步分析各类器物演变规律，总结其地域特点和发展特征^[48]。该文收集的资料较全，惜内容略简；熊昭明将合浦汉墓特有的铜井仓灶完整组合与北方地区同期出现的井、灶等进行对比，认为两者之间并无直接关系，合浦所出仿自当地的陶器，为本地制作，推测为临时“订制”。出土铜井仓灶的墓葬，规模较大，随葬品丰富，墓主人身份地位较高。相邻的广西梧州发现的铜屋，很可能从合浦输入^[49]。蒋廷瑜对汉代出土的镌刻花纹铜器，分种类、制作工艺、时代和制作中心的推断等方面进行系统论述，认为此类铜器的流行时间上起西汉中期，下至东汉晚期，岭南地区尤其广西东南部，是汉代镌刻花纹铜器的主要产地和制作中心^[50]。文中选取的标本主要出自广西地区汉三郡治所的梧州、贵港与合浦，而三地之中，以合浦最多。不过，赵化成却认为，所谓的镌刻花纹，多为铸造^[51]。但小管如何，此时青铜器在中原已日渐式微，而在合浦，以镌刻花纹（或铸造细线纹）为主要特征的精美器物，如日中天，显示了作为汉代港口城市繁荣的一面。

其余合浦汉墓出土的琥珀印章^[52]、玉器^[53]、灯具^[54]、仿铜陶礼器^[55]、陶屋^[56]、陶井^[57]等，

也有研究专述或涉及。

（三）葬俗研究

主要涉及合葬墓、外藏椁及架棺葬、碎物葬、厚葬等方面内容。这些习俗，虽糅合了多种文化因素，但皆源自本土，反映了作为汉礼中重要内容之一的丧葬制度所固有的稳定性。“事死如事生”的厚葬之风盛行，使得作为奢侈品的珠饰有较大数量出土。

合葬古已有之，汉代是夫妻合葬墓的重要发展和转型时期。在合浦已发掘的各个墓区中，均有合葬墓发现。蒋廷瑜认为岭南地区的同坟异穴夫妻合葬墓出现于西汉早期，西汉中期开始流行，并盛行于西汉晚期。合葬墓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和长期采用木椁相关，是同坟同穴合葬墓的变体或旁支，虽是一种带地域性的葬式，但并没有形成本地的特殊葬俗，不能把它作为特有的民族习俗来看待。而且补充，岭南地区自东汉前期起盛行小砖券墓，由于砖比木材坚固耐久，夫妻同穴合葬一般不成问题，同坟异穴合葬就自然而然地消失了^[58]。林强把岭南汉代夫妻合葬墓分为同坟异穴和同坟同穴两个类型，认为其演变发展是同时的，但东汉时期同坟异穴合葬墓已明显减少，还认为岭南地区的合葬墓具有本地特点，在形制和发展演变方面与中原地区有较明显的差异^[59]。合葬墓的葬俗源自中原，西汉前期和中期，夫妻合葬墓与以前一样，采取异穴合葬的形式，西汉中期以后，制度一变，除帝陵以外，一般都采取夫妻同穴合葬^[60]。合浦的合葬墓以异穴合葬为常见，最早出现在西汉晚期。从考古发现来看，东汉时期并未消失，甚至依然盛行，东汉晚期的砖室墓中，风门岭 M24、寮尾 M13、九只岭 M4 和 M6、第二炮竹厂 M14 等均属这种类型。异穴合葬墓的长期流行，笔者以为，这是由于合浦地处偏远、葬俗演变滞后所致，而与所处的自然环境和长期采用木椁的关系并不大。

合浦汉墓中，有带外藏椁。广西汉墓的外藏椁制度在西汉早期由中原地区传入时，尚保存真人殉葬的习俗，到西汉中晚期确立“厨、廐之属”的内涵，再到东汉早期的衰落，与中原地区发展基本同步，但也表现出一些不同的区域特征^[61]。西汉晚期合浦共发现 6 座外藏椁墓，其中堂排 M2b、凸鬼岭 M6、堂排 M4 和望牛岭 M1 为耳室形，风门岭 M26 和另一座 1985 年发掘于合浦炮竹厂的木椁墓，外藏椁置于墓道底端。推测这些墓葬的主人应为郡守级的官吏或权贵阶层，也可能是南下的汉人。广州汉墓中，未见合浦出现的外藏椁形式，反映了两广汉墓之间的历史分野^[62]。

汉代合浦盛行厚葬之风。林强将广西汉代厚葬分为西汉和东汉两大时期，西汉时期有大型棺椁墓和中型墓两种厚葬方式，为上层统治阶级、贵族所采用，东汉时期则多为中型砖室墓，随葬品明显减少。认为厚葬习俗产生的主要原因，有精神信仰、儒家思想和经济发展三个因素^[63]。事实上，厚葬之风不仅仅局限于“上层统治阶级、贵族”，合浦的许多中小型汉墓，无论是构筑用工用材，还是随葬器物，相对于墓主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而言，亦入厚葬之列。厚葬之风在汉代社会是普遍盛行，富者奢靡僭越，一般百姓穷尽财产，谓“世以厚葬为德，薄终为鄙，至于富者奢僭，贫者单财，法令不能禁，礼仪不能止”^[64]，以至于“废事生而营终亡，替所养而为厚葬”^[65]。

合浦汉墓的一些其他葬俗，也有学者注意到。岭南汉墓中开口常见的柱洞，郑君雷按性质和功用划分为“封门排柱”“椁盖顶柱”“椁板壁柱”“棺架立柱”“甬道门柱”“棺椁围柱”和“墓上表木和墓上建筑”等七类，认为文昌塔 M6 和 M8 在墓道底端近墓室处的柱洞，应为甬道门柱，而文昌塔 M5 和罗屋村 M3 墓口的柱洞，似与筑墓时搭建的临时建筑有关^[66]。岭南战国秦汉还现架棺

葬俗，合浦母猪岭 M4 应属此类，上层为棺室，下层为器物室^[67]。此外，合浦汉墓中还发现了碎物葬，其中汽车齿轮厂 M9 和 M11 随葬的部分器物残块，分置几处，而且相距甚远，应为入葬时有意打破后放置；第二炮竹厂 M4 出土一面铜镜，仅见一小段外缘。碎物葬早在中原的史前墓葬出现，商周至秦汉时期在越族地区仍较普遍，商周时期的武鸣马头元龙坡墓地、广东博罗横岭山以及桂平大塘城、贺州凤凰岭汉墓均有发现。富霞认为，墓主为汉化越人的可能较大^[68]。

（四）其他研究

墓葬形制方面，与域外因素有关的叠涩穹隆顶，其源流受到了关注。学者结合相关研究指出，东汉晚期流行于合浦乃至岭南一带的叠涩穹隆顶墓，其构筑方法受到了中亚地区帕提亚—巴克特里亚系统的影响^[69]。

彭长林^[70]、邓家倍^[71]、王元林^[72]、覃主元^[73]等学者还从不同角度论述汉代合浦港的作用和重要地位，一些讨论涉及合浦港现今的大致方位。在开展合浦港考古工作十多年后，熊昭明对其阶段性进展予以了介绍^[74]。此外，2004 年召开“中国·北海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理论研讨会”，还结集收入了广西文物工作队课题组及司徒尚纪、黄铮、吴三保、廖国一、丘立诚、黄启善、傅举有、程存洁、李富强等学者的有关论文^[75]；2016 年 10 月，北海举办“汉代海上丝绸之路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收到论文 100 余篇。上述论文，不少基于合浦汉墓的出土资料。但值得注意的是，较早前有学者从近代地方史志出发，错误析读考古资料，有关港址的结论，显得可靠性极低^[76]。

还有学者从汉墓资料出发，试图对合浦乃至岭南的秦汉社会作初步复原。对于岭南汉文化的形成过程，郑君雷认为，岭南汉文化的形成是建立在汉越民族融合的基础上，其优势地位是在西汉中晚期确立，表现为广州、合浦等地汉墓与中原和岭北汉墓的发展轨迹已经趋同，鲜见越式因素，但地方特点仍然突出，可视为汉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77]；富霞、熊昭明着眼于合浦发现的土墩墓，结合江浙、福建、广东、湖南和越南北部的发现，论述史载从先秦时期开始、沿东南沿海的“越人南迁”路线的真实存在，说明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开通之前，北部湾地区与东南沿海通过海路的密切联系已经存在^[78]；蒋廷瑜就考古发现的铁质农具、种子、农副产品以及与相关的陶仓模型明器等，对包括合浦在内的汉代广西农业概况作了概括^[79]；洗剑民从岭南的视角上，论述农业、青铜业和冶铁业、商业萌芽等内容^[80]，吕名中对岭南的经济发展及特色亦作了探讨^[81]。

第二节 合浦汉墓的分期

现已公开发表的合浦汉墓约 300 座，分为五期。合浦汉墓的五期划分，反映了两汉时期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的演变和发展过程。与海外贸易和交流相关的珠饰零星出现在西汉中期，西汉晚期起，珠饰的种类和数量不断增多，直至巅峰，东汉晚期末段则开始逐渐减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兴起、繁荣和衰落的各个阶段。

一 西汉早期

即南越国时期的墓葬，此前在合浦一直是缺环，直至近年，双坟墩 2 号墩的发掘以及 1987~1988 年文昌塔汉墓资料的出版，我们对这一时期的墓葬形式才有了初步的了解。

土墩墓的发现历史可追溯至 2002 年，时广西文物工作队汉代海上丝绸之路课题组在大浪古城

一带调查时，在古城北约 800 米处的红花坎村发现两个大土墩，当地称为“双坟墩”，疑为墓葬。遂于 2004 年对其中编号 D1 的一墩进行勘探和试掘，因发掘方法欠妥，仅清理出一批器物，并未发现墓穴。2012 年 6 月，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对 D2 进行布方发掘，最终确认为土墩墓。

D2 外观呈馒头状，平面为椭圆形，南北径 21.4 米，东西径 34.7 米，中部残高 1.6 米。土墩墓是在早期建筑废弃之后，选择较为平坦且地势略高的区域，铺设垫土层，形成比周围高的土台，然后在土台的中、南部开挖墓穴。该土墩墓为一墩多墓结构，墩内共发现早期墓葬 3 座，均为长方形熟土浅坑，规模较小，形制简单。随葬器物均为陶器，有瓮、杯和甑三种，共计 14 件。

三座墓葬形制相同，其中 M3 和 M4 随葬器物为瓮和杯组合。M2 仅出土 1 件陶甑，其纹饰、陶色、陶质及制作方法与 M3 出土的 A 型 I 式陶杯一致。杯和甑，饰细布纹，这两种器物均可在浙江地区战国墓中找到原型，其中 M2 出土的陶甑与浙江安吉垅坝 D12M2 所出贯耳罐的形制、纹饰和陶质均相同^[82]；M3、M4 出土陶杯同嘉兴地区发现的印纹陶形制、纹饰，极为相近^[83]。墓葬年代应与两广地区米字纹陶较晚的类型相当。两广地区迄今所见的米字纹陶遗存，除增城西瓜岭等部分早至战国晚期外，大多数应在秦或西汉早期^[84]。

双坟墩墓主为南迁的越人，至合浦后继续沿用吴越地区特有的墓葬形制。D2 出土的小件器物，如高温、薄胎、施釉的杯和甑，系直接从越地带入，而低温的陶瓮，无疑是在当地仿制吴越地区的同类器物。

竖穴土坑墓也是这一时期主要的墓葬形式。较为明确的是文昌塔第一期汉墓中的窄坑土坑墓，共 34 座。除 9 座无器物、1 座器物残碎不可辨外，余 24 座中，有 11 座出土器物均为越式，有的仅随葬 1~2 件罐，其余多是罐、联罐、双系罐、甑、匏壶、三足罐、三足盒等某几类器物的组合，另 13 座出土器物以越式为主，但同时发现少量小碗、釜、鼎、盒、壶、带钩等汉式器，以及少量铜、铁制兵器等。通过与广州汉墓的对比，年代应属西汉早期的后段。文昌塔报告还提及有少量早于汉代的墓葬，但没有归入，故它们的形制和出土器物不详^[85]。这部分“早于汉代的墓葬”，也不排除属于本期前段的可能性。

二 西汉中期

本期年代上限为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下限划在元、成之际（约公元前 32 年），前后约 80 年。这一时期的墓葬，可分为前、后两段。

前段仍见土墩墓，但以竖穴土坑墓居多。双坟墩 D1 的年代较 D2 晚，判断为西汉中期。D1 清理发现陶瓮 2 件，陶钵、碗、杯、网坠及铜斧各 1 件，疑为墓葬随葬品。陶瓮属几何印纹硬陶，烧制温度较高，制作精细，为南越国时期后段常见，但器物组合相较于 D2，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除越式器杯、甑、瓮外，还出现中原汉式器陶纺轮、铜斧等，表明这一时期汉文化已进入合浦地区，并与本地文化开始交流和融合。文昌塔第一期的 30 座长方形宽坑墓，绝大多数不带墓道，随葬器物多既有越式器又有汉式器，鼎盒壶仿铜陶礼器已出现，但数量较少，组合不完备，鼎为斜足形，壶颈部短粗，多为软陶，还见小碗、釜、带钩、纺轮、铜镜、铁杵等汉式器。这类墓葬同以越式器为主的窄坑墓差异明显，或归入本段为妥。两种不同类型的墓葬并存，应是反映设置郡县之初，本地越人和外来越人存在不同的聚居区。

后段比较明确的是文昌塔第二期墓葬，共 36 座。形制以竖穴宽坑为主（占 31 座），已不见生

土二层台结构，但带墓道的墓普遍增多，窄坑墓渐趋消失。随葬品以陶器为主，主要有陶器、铜器、铁器、滑石器，汉式器的数量和种类均有所增加。风门岭 M27 则为单室木椁墓，斜坡式墓道高、距墓底一定的距离起坡。陶器则以红色软陶为主，方格纹或素身，组合以瓮罐为主，仿铜陶礼器鼎盒壶钺以及模型明器井仓灶开始出现，但组合多不完整；青铜礼器见鼎壶钺，盃、枝形灯、釜甑等仅见于本期。此外，文昌塔汉墓中，还出现了五铢钱，以及少量的玻璃、水晶、肉红石髓和玛瑙珠饰。

后段除瓮罐等少数越式器外，可以看出汉式器逐渐成为主流。前后两段的截然变化，反映了合浦始设郡县后，随着汉文化的大举进入，埋葬习俗产生了深刻变化。

三 西汉晚期

本期年代上限紧接西汉中期，下限至建武元年（公元 25 年），前后 50 多年。

本期发现大中型墓葬较多，且完整墓葬不少，因而资料丰富。形制方面，绝大多数应为木椁墓。部分木椁墓，如汽车齿轮厂 M2 和 M3、廉乳厂 M2、电厂 M1 以及凸鬼岭 M5 和 M9，无墓道，规模较小，其余多为带墓道的单室木椁墓，少数还有甬道。大中型墓葬做法较为讲究，填土多经拍实，椁室与墓壁之间或椁室之上以木炭、卵石等相间夯筑，还有以石膏泥封护椁室四周，或于椁室底部铺砂、木炭和石膏泥等以防潮。几座大中型墓带象征“厨廐”的外藏椁，有耳室形和置于墓道底端两类。夫妻合葬在本期出现，以异穴合葬墓为主，兼有少量同穴合葬墓，男性墓穴规模一般较女性大，随葬器物也多。

陶器以几何印纹硬陶为主，仅有部分红胎软陶。硬陶以灰白胎和灰色胎为主，烧制温度高，多施青黄釉，纹饰丰富多样，有方格纹、方格纹加戳印、水波纹、羽纹、连续三角纹、柿蒂纹、篦点纹等。瓮罐组合继续沿用，方格纹底加覆戳印比较普遍，瓮如前期有直领如短颈，但已均为硬陶，腹部长圆，最大径居中或偏上，罐的种类多样，短颈不如前期明显，或演变为折领，腹部大都扁圆；井仓灶模型明器组合大多完备，仓演变为前横廊封闭开门，仓底对穿四圆孔，灶形升高，出现额墙，早期的圆柱形烟凸变为龙首形；仿铜陶礼器多仅见壶，鼎次之，偶见盒，钺仅发现 1 件（风门岭 M23a:40）。本期新增了樽、碗、灯、魁、卮、耳杯、熏炉、长颈壶、铎壶等器物，陶塑家禽家畜、人俑等也在本期出现。

本期铜器出土数量较多，望牛岭 M1 和风门岭 M26 等大中型墓葬随葬铜器数量约占出土器物的一半。除前段所见器物外，另有盒、三足小壶、长颈壶、提梁壶、扁壶、提梁钺、格盒、三足盘、魁、卮、风灯、席镇、耳杯等出现，器物多镌刻精致繁缛的花纹。车马器、动物模型及完整组合的建筑明器等均为本段始见。铜镜有四乳四螭镜、昭明镜和连弧纹镜，铜钱主要为五铢钱，后期出现剪轮五铢。

玉器发现的数量较少，仅出自大中型墓葬，种类有带钩、剑璲、璧、碗、饰品及葬玉等滑石器在本期早些时候较为流行，且种类繁多，有鼎、壶、钺、璧、暖炉、方罐、樽、提筒、盘、杯、耳杯、釜、锅、勺、杵、白、灯、案、几、井、仓、灶、屋、厕等。风门岭 M23 出土滑石器最多，占出土器物的一半，年代略晚的墓葬，滑石器多仅存暖炉一类。

玻璃、石榴子石、琥珀、玛瑙、水晶、肉红石髓、蚀刻石髓、绿松石、金银等珠饰，本段较为流行，在约半数墓葬出土，其中玻璃珠出土数量巨大。

典型墓葬有堂排 M1、M2、M3、M4，凤门岭 M23、M26，望牛岭 M1 以及 1999 年凸鬼岭 M6、M11、M19 等。

四 东汉早期

本期年代上限在建武元年，下限在建初之前（公元 75 年），前后约 50 年。

木椁墓在本期仍沿用，新出现砖木合构墓和直券顶砖室墓。砖木合构墓中，九只岭 M5 仅封门用砖，黄泥岗 M1 前室为砖圻，铺地砖，顶部用木料封盖；砖室墓形制简单，规模较小，多为单室，底部不分级，墓壁多为单砖或双砖错缝结砌，单砖起券。

本期出土陶器器类延续前期，仍以灰白胎硬陶为主，陶质、陶色也比较相近，但部分器形整体变小，纹饰有所简化，多饰弦纹，少量饰方格纹和各类戳印纹。陶罐数量较前期减少，腹部较扁；瓮折颈，身显直；仿铜陶礼器组合中，钁已不见，中原式鼎逐渐减少，带三斜足的越式鼎增多；壶仍有较多出土，形体较前期小，短颈，壶腹由圆鼓变为扁圆，圈足明显外撇。模型明器常见井、仓和灶，还新出现溷。井为圆形地台，井栏收束较明显，一般带井亭盖；仓有横廊，大部分有柱足，屋顶刻划细致瓦垄，现垂脊和脊饰，双室仓也为本期新见；灶体和额墙普遍较前期高，龙首烟突开始简化。

铜器的数量、种类，均较前期减少，且器形变矮小，纹饰简化，篆刻花纹呈现衰落趋势。本期铜钱除五铢、剪轮五铢外，另出现大泉五十。本期沿用昭明镜、日光镜和四乳四螭镜，但昭明镜和日光镜的字体已发生变化，新出现四神规矩纹镜。四神规矩纹镜的出现或早于王莽时期，但其兴盛却为王莽时期。

滑石器的随葬数量剧减，仅个别墓葬出土，器物仅见暖炉一类。各类珠饰在本期仍较流行。

典型墓葬有 1991 年母猪岭 M1、黄泥岗 M1、九只岭 M5 和第二炮竹厂 M6 等。

五 东汉晚期

本期的年代，上限以建初为界，下限到东汉末，前后 140 多年。

墓葬形制以砖室墓为主，砖圻墓仍有少量发现，偶见土坑墓，如第二炮竹厂 M8 和 M19。砖室墓形制多样，规模趋大，新出现穹隆顶墓、穹隆顶墓合券顶墓、横直券顶砖室墓和横直券顶砖室墓合穹隆顶墓等。结构更复杂，墓室多由单室演变为多室墓，底部和券顶也多有分级，甬道、侧室、耳室、壁龛等普遍出现。墓壁及券顶一般为双砖结砌，铺地有条砖和方砖。异穴合葬墓在本期仍继续流行，同穴合葬墓也间有发现。

陶器仍以灰白胎、灰胎硬陶为主，但器形普遍矮小，制作不及前期精致，但组合形式延续前期。除器形高大的长腹瓮、四耳瓮外，另有大口、器形较矮小的陶瓮也有出现；器形较大的罐已不多见，小罐纹饰简化，多饰弦纹，腹部扁圆，部分下坠。鼎数量少，形体较大的盒多为烧制温度较低的小盒所取代；壶形体亦较小，颈部收束，腹部下坠或折腹，凤门岭墓区的陶壶甚至已经消失。溷和屋模型明器本期较流行，井仓灶组合多较为完备。井栏上部收束明显，下部直或斜直；仓底部有柱足，前有护栏或者封闭的横廊；灶面呈前高后低的灶，还出现釜与灶体结为一体的形制，部分灶身有人俑或狗，烟突简化，多作柱状。高温釉陶器、三合式陶屋、重檐陶仓及陶簋等均为本期始见。

本期随葬铜器数量不多，且制作简单，胎薄，纹饰简单，篆刻花纹铜器已少见，精致远不及

西汉晚期。常见器类有壶、提梁壶、釜壶、樽、盆、灯、熏炉、铜镜、碗、盘、削等。车马器、兵器也有少量出土。昭明镜、日光镜继续沿用，四神规矩镜较为流行，新出现云雷连弧纹镜。五铢、大泉五十仍见，新发现货泉和大布黄千。

本期的珠饰、金银器等均有所减少，显示厚葬之分已逐渐衰落。但本期零星出现了一些非贸易品，如波斯陶壶、铜钹等，而且出现了叠涩穹隆顶墓，一些外来的文化因素也在本土器物上有更多体现。

本期典型墓葬有 1991 母猪岭 M4，九只岭 M6，凤门岭 M24，寮尾 M13a、M13b、M16，第二炮竹厂 M8 等。

第三节 合浦汉墓的区域特征

合浦在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设郡县后，迅速融入汉文化的历史进程，并持续发展。藉江河沟通内陆之便利，合浦成为汉王朝对外开放的重要港口，贸易往来于东南亚及南亚各国之间。在以汉文化占主体的合浦社会中，各种文化互相交流融合，共同促进了合浦的发展和繁荣，因而表现出比较明显的区域特征。归纳起来，有如下三个方面。

一 发展演变脉络清晰

西汉早期，合浦属南越国辖。南越国下的郡县，史载很少，且多语焉不详，尚可考者有南海郡的番禺、龙川、博罗、揭阳、浚阳、含涯和桂林郡的布山、四会^[86]。由于合浦地处边远，从发现的遗存来看，人类活动的遗迹不多，还没有确凿证据显示南越国已在合浦设县或实施了有效统治。但在大浪古城址和县城附近的草鞋村，这两个相隔 10 多千米的聚落附近，分别发现了一定数量的土墩墓和竖穴土坑墓。

设郡县后，越式土墩墓在合浦还延续一段时间，随着汉人的大量涌入，出现竖穴土坑墓为主的墓葬形制，葬俗产生了明显变化。自西汉中期后段起，流行竖穴木椁墓，大部分带斜坡墓道。东汉早期继续沿用竖穴木椁墓，并出现砖木合构墓和小型的直券顶砖室墓；至东汉晚期，砖室墓的规模增大，构造也趋于复杂，分室有甬道，带耳室、侧室等，除直券外，还见横券，穹隆顶墓逐渐增多，且墓壁和券顶多为双隅结构，整体显得更为结实稳固。土坑墓仅东汉零星发现，应与当地富庶及厚葬之风有关。合葬墓贯穿始终，以异穴合葬为主，鲜见同穴合葬。

随葬陶器除瓮、罐、提筒、簋、带足器等部分器物外，其余多为汉式器。瓮罐和井仓灶模型明器是合浦汉墓自西汉中期起各个阶段比较固定的组合，而具中原特色的仿铜陶礼器则不完整，多仅见鼎、盒、壶，钺较少见。汉越融合的进程，就一般演变规律而言，自西汉晚期起，越文化因素逐渐减少，到东汉晚期，越汉已逐渐趋同，而随着对外贸易往来的增多，外来文化的影响有所加强。东汉晚期出现了高温釉陶，严格意义上的瓷器则几乎没有发现，显示了这一地区陶瓷生产技术相对落后。

二 显示多种文化因素的融合

随着中原汉人自岭北涌入，强大的汉文化在合浦迅速发展成为主流。合浦在与周边地区和域外的密切交往中，除保留部分越人自身的固有传统外，还受到楚、南越等文化影响，并呈现出浓郁的域外因素^[87]。除域外因素外，我们对越、汉、楚等文化因素分而述之。

（一）越文化因素

先秦至汉，合浦一直是越人的聚居区。“自交趾（同‘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粤分也”^[88]。具体而言，居住在合浦的越人属百越中的骆越。骆越分布“当在左江流域至越南的红河三角洲地带”，即今广西南部^[89]和越南北部^[90]。在《后汉书》等典籍中，当地越人也被称为“蛮夷”和“乌浒蛮”^[90]。

墓葬出土的越式器主要有瓮、罐、提筒、簋及带足器等，常见陶器组合为瓮罐。1987~1988年发掘的文昌塔墓地，属第一期即西汉早期的34座A型窄坑土坑墓，形制简单、规模小、随葬器物较少，以陶器为主，主要为瓮、罐、折肩罐、联罐、甑、匏壶、三足罐、三足盆和提筒等，不见代表汉文化因素的鼎、盒、壶、钫组合，地域特色明显，墓主应为当地土著民族。西汉中期合浦始置郡县后，受先进的汉文化影响，本地越人逐渐被汉化，墓葬形制、出土器物虽绝大多数为汉式，但一些墓葬的骆越文化特征仍较明显，如2005年文昌塔墓区发掘的6座西汉晚期墓，随葬器物组合主要为瓮罐和壶，出现三足五联罐等典型越式器，M2墓室后壁一侧有三块不规则的石块，这种做法在武鸣马头发掘的先秦墓中有见，经考证族属为骆越人，墓坑积石是其重要的特点之一^[91]。马头元龙坡墓地的另一特点是流行碎物葬，合浦汉墓中也有发现，较明确的

有近年发掘的西汉晚期墓汽车齿轮厂M9、M11和第二炮竹厂M4，这3座墓葬未经盗掘，保存完好。其中汽车齿轮厂M9和M11随葬陶器多为破碎，部分残块分置几处，距离甚远，应是入葬时有意打破而为之；第二炮竹厂M4出土的1件铜镜，也仅见一小段外缘^[92]。

外来越人墓明显的是大浪汉城址北面发掘的土墩墓。墓主应为江浙吴越后裔，因战乱或其他因素南迁至此。此外，还应有始见于汉代文献的南越。合浦汉墓的形制及出土的越式器，与广州汉墓所见多较相似，体现出合浦与南越中心地区往来交流的密切^[93]。

（二）汉文化因素

有关汉人南下与越杂居的记载，秦已有之。秦始皇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三十四年“适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94]。还有赵佗“使人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95]。在两汉时期多次平定交趾和海南的叛乱中，也应有部分将士留在合浦当地。

汉王朝向岭南派遣官吏也多见诸文献，如西汉平帝年间“汉中锡光为交趾太守，教导民夷”^[96]，东汉顺帝时，交趾发生叛乱，遂“拜祝良为九真太守，张乔为交趾刺史”^[97]，等等。据统计，交州刺史籍贯可考者15人，交州太守籍贯可考者29人，分别来自扬州、荆州、徐州、益州、兖州、豫州等地；都尉可考者3人，交州本土仅有1人。交州最有势力的士燮家族出太守5人，虽云士燮是本土广信人氏，但其籍贯却为鲁国^[98]。因此，合浦汉墓有位至郡县一级的墓主，极大可能是中原王朝派至岭南的汉族官吏，如西汉晚期的望牛岭M1，墓主人应是西汉晚期的郡县高级官吏或地方豪强^[99]，因陶提筒上有“九真府”款，故可能曾任九真郡太守^[100]。再如东汉早期、墓主为徐闻县令陈褒的黄泥岗M1。此外，汉代迁徙合浦的，还多发配之人。从西汉晚期的汉成帝阳朔元年（公元前24年）到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的30年间，《汉书》和《后汉书》中记载的因罪“徙合浦”的，就达10多起^[101]。这些徙合浦的罪人，极少得皇帝的特赦令回到原籍，如王章弟王商复为大将军辅政后，“白上还章妻子故郡”，王章妻得以返乡^[102]，但其中的绝大多数人，就

只能老死葬于合浦了。

从墓葬形制来看，自西汉中期始，合浦流行带斜坡墓道的竖穴木椁墓，溯其源流，这类墓葬在中原商周时期已广泛使用。东汉早期合浦的直券顶砖室墓，在中原西汉中期已有出现，如洛阳西郊M3244的“小砖弧顶墓”^[103]。东汉晚期合浦流行双隅直券顶砖室墓，穹隆顶墓和横直券顶墓的数量也不少。单穹隆顶墓在中原地区出现于东汉早期，双穹隆顶和横前堂砖室墓则出现在东汉中期^[104]，其后在合浦的流行，应是受到了中原同类型墓葬形制的影响。

合浦汉墓出现的一些埋葬习俗，如外藏椁、合葬墓和家族墓，也应是受到了中原汉文化影响所致。外藏椁源于商代后期墓内的壁龛、墓外殉人和车马坑，最晚于春秋晚期至战国形成了外藏椁。合浦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墓的外藏椁形式与中原相近，位于墓道底端或以耳室形式位于墓室一侧，象征“厨廐”；合葬墓在中原地区，周代已有发现，为异穴或称并穴合葬，战国时期逐渐增多，西汉开始流行，自西汉中期起，中原地区由异穴合葬发展为同穴合葬。从合浦一地来看，两汉时期普遍流行异穴，是由于当地文化发展滞后所致。有学者指出，夫妇同坟异穴合葬是瓯骆独有的葬俗^[105]，但究其源头，仍自中原；东汉中西晚期中原地区流行的家族葬在合浦也有迹可循，如1996年合浦母猪岭发掘的3座墓葬，其中M4和M5并列，M4出土“黄营”印章，M6出土“黄良私印”，报告称这片墓地应属黄姓族葬。

除墓葬形制和葬俗外，合浦汉墓出土的陶器、铜器及器物组合也多与中原地区相近。合浦汉墓的陶器主要为瓮罐、仿铜陶礼器和井仓灶模型组合，其中瓮罐组合为岭南地区常见，后两组同中原地区早些时期的发现一致。研究显示，随葬的青铜器虽绝大多数应为本地自制，但器形基本源自中原。一些则是直接传入，如风门岭M26出土的1件铜提梁壶，壶口有焊接修补痕迹，应为墓主心爱之物，此型壶在河南洛阳、汲县、辉县的战国墓中有出土^[106]。扁壶、蒜头壶等一些秦文化的典型器物，也随汉文化南下，出现在合浦汉墓中。在保存相对完好的大中型墓葬中还出土有铜、银、滑石、琥珀等各类材质的私印，印文姓氏多见于今中原地区，如盐堆M1“张偃私印”、汽车齿轮厂M11“王恭私印”、1992汽车齿轮厂M40b“公孙德印”、1996母猪岭M6“黄良私印”、风门岭M23b“吴茂私印”、黄泥岗M1“陈褒”印、1995第二麻纺厂M30“赵（初）君印”等，其墓主人为南下汉族或其后裔的可能性较大。

（三）楚文化因素

楚地和岭南毗邻，广西北部的五岭之间有两条天然通道与湖南连接，其一自湖南道州入广西贺县（州），另一自湖南静江入广西全州，东汉时还在这些通道上修筑了“峽道”，故两地交流密切。从出土的文物看，早在春秋时期楚文化已随楚人越过南岭山脉传入广西，战国时期增多，并一直延续至汉代。在合浦大量的移民中，应不乏楚人的后裔，他们与越人杂处，从事边疆屯守与开发。

合浦汉墓的部分埋藏习俗可追溯至楚地。合浦部分西汉晚期的大中型木椁墓，如望牛岭M1、堂排M3和风门岭M26，其椁室四周用白膏泥封护，或周边积沙、积炭用以防潮。这些较为考究的封护方式，在西汉早期的楚地大型墓葬中已比较流行。滑石器最早在湖南长沙战国中期墓出现，西汉初期开始繁荣。西汉晚期，合浦大中型墓中也流行随葬滑石器，如风门岭M23，1999年凸鬼岭M4、M11、M19，堂排M1和M2a等，其中仅风门岭M23，就出土滑石器113件，占出土器物的一

半左右。堂排 M2b 随葬泥质冥钱的习俗在长沙等地的西汉早期墓中已流行。另学者考证，堂排 M1 出土的“劳邑执封”琥珀印有楚制因素。谭其骧认为“这颗印应为那时的楚国铸以颁赐被封为执封的朱庐酋长的”^[107]；黄展岳虽认为“朱庐执封”“劳邑执封”两印可能是南越国自铸的，分别赐给朱庐和劳邑两个地方官的官印，但不排除流徙南越的楚国后人自铸官印的可能性^[108]。

出自合浦汉墓的器物，除璧等滑石器外，其他一些也可在楚地早些时期的墓葬中找到原型，属楚式器。其一为小口、束颈、鼓腹、大平底陶罐，在湖北云梦西汉早期墓中已有出现（报告为瓮）^[109]。这类器物，九只岭 M5 出土 3 件（报告为“平底壶”）、寮尾 M16 出土 1 件。另一为球腹圜底罐，第二炮竹厂 M6 出土 1 件，年代为东汉早期，与湖北荆州高台西汉早期墓出土的 A 型 I 式圜底罐，形制相近^[110]。此外，以长沙为中心的“南楚”是楚国玻璃制造的中心地带，合浦发现的璧与长沙地区西汉早期墓所出形制、大小、纹饰均较相似，剑璜也多见于长沙楚墓，经检测分析为成分接近的铅钡玻璃，判断主要为楚地传入^[111]。

文昌塔 M168 出土的陶珠^[112]，也应是楚地传入合浦的器物（图一八）。战国早期以后，楚地成为中国蜻蜓眼式玻璃珠最为流行的地区，湖北和湖南等多地也因此出现了用陶土制作的蜻蜓眼式珠。这些陶珠是外来蜻蜓眼式玻璃珠在中国引发的模仿与变异^[113]。

此外，除前述的本土文化因素外，合浦还出土了铜釜和铜釜甑，一些学者分别称之为大口双耳耳巴式釜、巴式釜甑。一大一小两绉纹耳的铜釜，亦认为是巴蜀文化因素^[114]。以西南地区和合浦的密切交往，也是情理之中。



图一八 文昌塔 M168 出土陶珠（梁旭达摄）

三 出土大量海上丝绸之路文物

合浦汉墓集中出土了大量的珠饰，无论种类还是数量，均明显多于国内其他墓群，这与合浦港所处的位置及海外贸易直接相关。考古学与科技研究的初步成果表明，珠饰中的玻璃、石榴子石、琥珀、水晶、绿柱石、玛瑙、肉红石髓、蚀刻石髓和金器，器皿中的玻璃杯和碗，还有香料以及作为非贸易品的波斯陶壶和铜钹等，不少来自东南亚、南亚、西亚及地中海地区，而汉使团所携带前往的“黄金”，或为类似望牛岭 M1 出土的圆形金饼。此外，合浦汉墓还出土有反映域外文化因素植入的本地器物，如胡人陶俑、羽人铜座灯、陶钵生莲花器等。

东南亚、南亚地区的珠饰有相当部分出自遗址，且在遗址中显示出当地加工的迹象，而在合浦几乎都是从墓葬出土^[115]。

这部分内容，我们放在下一章详细论述。

- [1]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合浦县博物馆：《合浦风门岭汉墓——2003~2005年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页。
- [2] 本书汉墓的概念，不局限于汉式墓葬，而是泛指两汉时期的墓葬，特此说明。
- [3] 杨豪：《广东合浦发现东汉砖墓》，《考古通讯》1958年第6期。
- [4]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考古写作小组：《广西合浦西汉木椁墓》，《考古》1972年第5期。这座墓葬的编号为望牛岭M1，同时发掘的另一座墓，编号M2，资料未见发表。据当年参加发掘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李举荣先生回忆，两墓位于同一封土堆下，应属同茔异穴合葬墓。
- [5]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合浦县博物馆：《合浦风门岭汉墓——2003~2005年发掘报告》附录一，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
- [6]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合浦县堂排汉墓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4)，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
- [7]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合浦县博物馆：《广西合浦县凸鬼岭清理两座汉墓》，《考古》1986年第9期。
- [8] 蓝日勇：《合浦县廉州炮竹厂西汉晚期墓》，《中国考古学年鉴》(1986)，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90页。
- [9] 黄启善：《合浦县风门岭、望牛岭汉墓》，《中国考古学年鉴》(1986)，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90~191页。
- [10] 合浦县博物馆：《广西合浦县丰门岭10号墓发掘简报》，《考古》1995年第3期。
- [11] 梁旭达：《合浦文昌塔汉墓群》，《中国考古学年鉴》(1988)，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237页。
- [12]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广西合浦文昌塔汉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年。
- [13] 广西文物工作队、合浦县博物馆：《广西合浦县母猪岭东汉墓》，《考古》1998年第5期。
- [14] 广西合浦县博物馆：《广西合浦县母猪岭汉墓的发掘》，《考古》2007年第2期。
- [15]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北海市盘子岭东汉墓》，《考古》1998年第11期。
- [16]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合浦县禁山七星岭东汉墓葬》，《考古》2004年第4期。
- [17]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合浦县博物馆：《合浦县凸鬼岭汉墓发掘简报》，《广西考古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
- [18]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合浦县博物馆：《广西合浦县九只岭东汉墓》，《考古》2003年第10期。
- [19]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合浦县博物馆：《广西合浦县罗屋村墓葬发掘报告》，《广西考古文集》(第二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
- [20]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合浦县博物馆：《合浦风门岭汉墓——2003~2005年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
- [21] 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合浦县博物馆：《2005年合浦县文昌塔汉墓发掘报告》，《广西考古文集》(第三辑)，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
- [22]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内部资料。
- [23] 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合浦县博物馆、广西师范大学文化与旅游学院：《广西合浦县寮尾东汉至三国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2年第4期。
- [24]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合浦县文物管理局：《2009~2013年合浦汉晋墓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年。
- [25]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广西合浦县双坟墩土墩墓发掘简报》，《考古》2016年第4期。
- [26]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广州汉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
- [27] 李龙章在《南越国出土陶器与两广战国秦汉遗存年代序列》(《华南考古》(1))，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4年)一文中认为,《广州汉墓》对西汉前期墓的断代及分期与实际有较大出入,应予修正。

[2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秦汉卷》第八章第十一节“岭南地区汉墓”,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482~491页。

[29]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合浦县博物馆:《合浦风门岭汉墓——2003~2005年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

[30] 韦革:《浅谈合浦东汉晚期至三国时期墓葬形制的一些变化——从合浦岭脚村三国墓说起》,《广西考古文集》(第二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

[31] 后文提及的角轮形环、六棱柱饰、碗、杯等4件玻璃器。

[32]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合浦县博物馆:《合浦风门岭汉墓——2003~2005年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17~118页。

[33] 熊昭明:《广西汉代考古的回顾与展望》,《广西考古文集》(第二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

[34] 广西文物工作队、合浦县博物馆:《广西合浦县母猪岭东汉墓》,《考古》1998年第5期。

[35] 谭玉华:《合浦汉墓研究》,中山大学博士后出站报告,2013年;蒙长旺:《广西合浦两汉六朝墓葬研究》,中山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富霞:《合浦汉墓及相关问题研究》,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

[36] 安家瑶:《中国的早期玻璃器皿》,《考古学报》1984年第4期。

[37] 史美光、何欧里、周福征:《一批中国汉墓出土钾玻璃的研究》,《硅酸盐学报》1986年第14卷第3期。

[38] 黄启善:《广西汉代玻璃制品初探》,《中国古玻璃研究——1984年北京国际玻璃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年;黄启善:《广西古代玻璃制品的发现及其研究》,《考古》1988年第3期;黄启善:《广西发现的汉代玻璃器》,《文物》1992年第9期。

[39] 干福熹、黄振发、肖炳荣:《我国古代玻璃的起源问题》,《硅酸盐学报》1978年第6卷第1~2期;干福熹:《关于中国古代玻璃研究的几点看法》,《硅酸盐学报》2004年第30卷第2期;干福熹:《古代丝绸之路和中国古代玻璃》,《自然杂志》2006年第28卷第5期。

[40] 王俊新、李平、张巽、彭子成:《广西合浦堂排西汉古玻璃的铅同位素示踪研究》,《核技术》1994年第17卷第8期。

[41] Qinghui Li, Weizhao Wang, Zhaoming Xiong, Fuxi Gan & Huansheng Cheng, 2009. PIXE study on the ancient glasses of the Han dynasty unearthed in Hepu county, Guangxi. In book: Ancient Glass Research along the Silk Road. Edited by Gan Fuxi, R. H. Brill & Shouyun Tian.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p. 397-412.

王伟昭、熊昭明、李青会、干福熹:《广西合浦县出土汉代玻璃器的检测和研究》,《丝绸之路上的古代玻璃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

[42] 碧姬·博雷尔:《早期北部湾地区的汉代玻璃器皿》,《海洋史研究》(第四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43] 熊昭明、李青会:《广西出土汉代玻璃器的考古学与科技学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

[44] 熊昭明:《广西合浦汉墓出土铜钹略考》,《汉代西域考古与汉文化》,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年。

[45] 黄珊、熊昭明、赵春燕:《广西合浦县寮尾东汉墓出土青绿釉陶壶研究》,《考古》2013年第8期。

[46] 白云翔:《岭南地区发现的汉代舶来金银器述论》,《西汉南越国考古与汉文化》,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年;陈洪波:《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出土金珠饰品的考古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47] Xiong Zhaoming. 2014. The Hepu Han tombs and the Maritime Silk Road of the Han dynasty. *Antiquity*, Volume 88, Number 342. pp. 1229-1243.

- 熊昭明：《汉代合浦港考古与海上丝绸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年。
- [48] 富霞：《广西合浦出土汉代青铜器的初步研究》，《广西考古文集》（第四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年。
- [49] 熊昭明：《合浦汉墓出土的铜井仓灶》，《瓯骆汉风》，香港历史博物馆编，2014年。
- [50] 蒋廷瑜：《汉代篆刻花纹铜器研究》，《考古学报》2002年第8期。
- [51] 2016年10月在北海“汉代海上丝绸之路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作“岭南双绝：汉代细线纹铜器与漆绘铜器”的发言内容。
- [52] 黄展岳：《“朱庐执卦”印和“劳邑执卦”印——兼论南越国自铸官印》，《考古》1993年第11期；蒋廷瑜：《“劳邑执卦”琥珀印章考》，《中国历史文物》2004年第4期。
- [53] 熊昭明、谢日万：《广西出土的先秦两汉玉器》，《广西考古文集》（第三辑），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
- [54] 熊昭明：《广西汉代出土灯具研究》，《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2期；谢广维：《合浦汉代义化博物馆馆藏马座灯辨识》，《广西考古文集》（第五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年。
- [55] 朱海仁：《岭南汉墓出土仿铜陶礼器的考察》，《华南考古》（1），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
- [56] 曹劲：《先秦两汉岭南建筑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石拓、程建军：《汉代陶屋所反映的岭南民居的变迁——试论“三间两廊”的形成》，《建筑师》2013年第3期。
- [57] 李世佳：《广西汉墓出土陶井明器初探》，《农业考古》2014年第4期。
- [58] 蒋廷瑜：《汉代同坟异穴夫妻合葬墓浅议》，《南方文物》1993年第1期。
- [59] 林强：《岭南汉代夫妻合葬墓有关问题的探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
- [60]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390页。
- [61] 谢广维：《广西汉代“外藏椁”初探》，《广西考古文集》（第二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
- [62] 熊昭明、谢广维：《广西西汉中晚期墓葬的外藏椁》，《汉代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
- [63] 林强：《广西汉代厚葬习俗研究》，《广西民族研究》2000年第2期。
- [64]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卷一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51页。
- [65]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赵咨传》卷三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315页。
- [66] 郑君雷：《岭南战国秦汉墓的“柱洞”》，《四川文物》2010年第4期。
- [67] 郑君雷：《岭南战国秦汉墓的“架棺”葬俗》，《考古》2012年第3期。
- [68] 富霞：《合浦汉墓及相关问题研究》，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
- [69] 熊昭明：《汉代合浦港考古与海上丝绸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年，第145页。
- [70] 彭长林：《试论汉代合浦港的兴衰与海外贸易的关系》，《广西环北部湾文化研究》，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
- [71] 邓家倍：《合浦是中国汉代海上“丝路”始发港》，《广西地方志》2002年第5期；邓家倍：《再论合浦是中国汉代海上丝路始发港》，《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邓家倍：《合浦与徐闻在海上丝路始发港地位与作用比较研究》，《中国地方志》2005年第10期。
- [72] 王元林：《两汉合浦、徐闻与南海丝路的的关系》，《广西民族研究》2004年第4期。
- [73] 覃主元：《汉代合浦港在南海丝绸之路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1期。
- [74] 熊昭明：《汉代合浦港考古的新进展》，《岭南印记：粤港澳考古成果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博物馆编，2014年。
- [75] 吴传钧主编：《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
- [76] 陆露、张居英：《西汉合浦港口考辨》，《广西民族研究》2007年第1期。

- [77] 郑君雷：《俗化南夷——岭南秦汉时代汉文化形成的一个思考》，《华夏考古》2008年第3期。
- [78] 富霞、熊昭明：《从广西发现的土墩墓看越人南迁》，《考古》2016年第8期。
- [79] 蒋廷瑜：《广西汉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2年第2期。
- [80] 洗剑民：《秦汉时期的岭南农业》，《中国农史》1988年第3期；洗剑民：《汉代岭南的青铜业和冶铁业》，《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88年第3期；洗剑民：《汉代岭南的商业萌芽》，《岭南文史》1988年第1期。
- [81] 吕名中：《秦汉时期的岭南经济》，《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2期。
- [82] 浙江省安吉县博物馆：《浙江安吉垆圹D12土墩墓发掘简报》，《南方文物》2003年第3期。
- [83] 陆耀华：《嘉兴印纹陶遗址与土墩墓》，《东南文化》1989年第6期。
- [84] 李龙章：《两广地区米字纹陶类型遗存和广州汉墓的年代》，《考古》2006年第4期。
- [85]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广西合浦文昌塔汉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年，第3页。
- [86] 张荣芳、黄森章：《南越国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5~117页。
- [87] 富霞：《广西合浦汉墓主人族属及域外文化因素探讨》，《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8年第4期。
- [88]（汉）班固：《汉书·地理志》卷二十八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669页。
- [89] 蒋廷瑜：《从考古发现探讨历史上的西瓯》，《百越民族史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 [90]（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五、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25、340页。
- [91] 马头发掘组：《武鸣马头墓葬与古代骆越》，《文物》1988年第12期。
- [92]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合浦县文物管理局：《2009~2013年合浦汉晋墓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年，第75~76页。
- [9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秦汉卷》第八章第十一节“岭南地区汉墓”，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482~491页。
- [94]（汉）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53页。
- [95]（汉）司马迁：《史记·淮南王传》卷一一八，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086页。
- [96]（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循吏列传》卷七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462页。
- [97]（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卷八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38~2839页。
- [98] 秦佳：《两汉交州官吏及相关人物研究》，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14~22页。
- [99]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考古写作小组：《广西合浦西汉木椁墓》，《考古》1972年第5期。
- [100] 蒋廷瑜：《汉代篆刻花纹铜器研究》，《考古学报》2002年第8期。
- [101] 蒋廷瑜：《略论汉“徙合浦”》，《社会科学家》1998年第1期。
- [102]（汉）班固：《汉书·王章传》卷七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239页。
- [10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洛阳西郊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3年第2期。
- [104] 洛阳区考古发掘队：《洛阳烧沟汉墓》，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45页。
- [105] 蓝日勇：《汉代广西越文化特点简论》，《广西民族研究》1993年第3期。
- [106]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合浦县博物馆：《合浦风门岭汉墓——2003~2005年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84页。
- [107] 谭其骧：《再论海南岛建置沿革——答杨武泉同志驳难》，《历史地理》1989年第6期。
- [108] 黄展岳：《“朱庐执卦”印和“劳邑执卦”印——兼论南越国自铸官印》，《考古》1993年第11期。
- [109] 湖北省博物馆：《云梦大坟头一号汉墓》，《文物资料丛刊》（4），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
- [110]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荆州高台秦汉墓》，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73页。
- [111] 熊昭明、李青会：《广西出土汉代玻璃器的考古学与科技学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

155~156 页。

[112]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广西合浦文昌塔汉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 年，第 59~60 页。报告定名为“陶球”。

[113] 赵德云：《中国出土的蜻蜓眼式玻璃珠研究》，《考古学报》2012 年第 2 期。

[114] 陈文领博：《铜釜研究》，《考古与文物》1994 年第 1 期；吴小平：《汉代铜釜研究》，《东南文化》2003 年第 11 期；余静：《两广地区两汉墓葬的文化因素分析及文化发展过程》，《边疆考古研究》（第 15 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 年。

[115] 仅在草鞋村汉城址的扰土层中发现六方体白水晶 1 颗。参见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广西师范大学文化与旅游学院：《广西合浦县草鞋村汉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16 年第 8 期。